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PV.2378
7 October 1975

CHINESE

大会

第三十届会议

第二三七八次全体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五年十月七日星期二下午三时三十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托恩先生 (卢森堡)
后来由副主席代行职务: 萨法尔先生 (巴林)
(副主席)

- 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讲话
- 一般辩论〔9〕(续)

演说人:

盖里先生(格林纳达)
翁莱代先生(多哥)
加尔巴先生(尼日利亚)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五年十月八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三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三时四十五分会议开始

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讲话

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主席：我谨代表大会欢迎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到联合国来，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马卡里奥斯总统：主席先生，我非常高兴地代表塞浦路斯共和国热烈祝贺阁下当选为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届会议的主席。 阁下荣任卢森堡这个具有悠久和丰富民主传统的国家的首相兼外交大臣，在国际事务方面经验丰富，而且德才兼备，一定会使本届大会本着建设性和创造性的精神进行讨论。

我也要向上届主席，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阿卜杜勒阿齐兹·布特弗利卡先生表示深切的感谢。 布特弗利卡先生卓有成效地主持了第二十九届常会和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的讨论。

塞浦路斯共和国热烈欢迎本组织的三个新会员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佛得角和莫桑比克。 它们都已摆脱了殖民地地位，取得了它们作为国际社会成员的合法地位。 它们加入联合国是朝着这一个世界组织会员普遍性原则迈出的又一步，对此，我们表示祝贺。 我们希望不久将来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以及仍在殖民主义或外国统治下的其他领土全都加入联合国，从而完成这一个进程。

在开始谈论实质问题以前，我要向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博士致敬。 他专心致意地力图维护联合国的原则，努力不懈地谋求达成它的目的。 我国特别感谢他为了觅致公正和平办法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而作出的贡献。 他以极大的容忍和公正的精神主持了维也纳和纽约的谈判，努力按照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来达成一项解决办法；他一心一意地不断努力，为塞浦路斯问题进行斡旋。 对此，我们表示深切的感激。

今年是联合国成立的第三十周年。联合国的会员国由当初的五十个国家增加到现在的一百四十一国，这表现了本组织的重要性，而且使本组织真正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大家庭。联合国会籍的普遍性指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并强调了自决和独立原则的逐渐获得接受和广泛应用。人类已经开展了一个新的时代。旧的国际思想行为的形态和习惯现在都已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是世界互相依存，构成一体的新观念。技术的进步缩短了世界各地的距离，任何地方发生的事情都有全球性的影响。今天在我们这个小小的世界里，和平、自由、社会和经济正义等原则和价值是缺一不可的，各国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合作也是非有不可的。我们可以认真地说，我们这个互相依存的世界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共同进步，便是共同遭殃。

最近在赫尔辛基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和平会议点出了这种合作的必要性。该会议最后议定书所载的各项原则是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其中适当地考虑了过去三十年累积的经验，和当前的世界局势。签署国之中包括拥有可在数小时内毁灭全球的工具的国家，这一点更使赫尔辛基会议显得特别重要。

大家越来越认识到，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可以通过单方面的行动、不顾其它国家的合法利益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通过互相容让与合作才是正途。第七届特别会议在修改与重建世界经济秩序走向一个更公平合理的制度和减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方面，迈进了一大步。为此目标，仍待努力的地方固然不少，但已作出一个良好的开端。大家对此问题的重要性和对这个问题需要现实地处理两点已有普遍的认识，使我们可以希望不久就能取得更具体的结果。

走向新经济秩序和人类更美好的前途的努力，与裁军问题特别是与停止螺旋上升的军备竞赛问题，有密切的关系。现在每年浪费在毫无意义的军备上的数目，已经达到 3,000 亿美元的惊人巨额。只要把这些浪费的开支的一小部分用在积极的发展上面，就可以克服现时的严重经济困难，并大大缩短现存的差距。这样地停止或减低军备竞赛，将有助于和平与发展的事业，这两项都是联合国的主要目

标。此外，建立无核区——在这方面已作出了充满希望的开端——将会是朝正确方向走的积极步骤。因此我们支持完全并有效地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的一切努力。

不过，在缺乏国际安全 and 法律秩序的情况下，期望有效地停止军备发展是不切实际的，也是徒劳无功的。因为在一个国际无政府状态的世界上，国家怎能削减其战争潜能呢？我确实认为我们的首要和集体努力，应该集中于建立有效的国际安全 and 法律秩序。为此目的，联合国的首要步骤之一是确保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得到有效的执行。

我并不打算就我们议程上那么繁多而重要的项目作详尽的讨论。我只想谈塞浦路斯将一如既往，始终如一地支持为了达到下列目标的一切倡议：消灭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把和平与正义带到南部非洲、促使解放事业、保护各地人权、提高对国际法的遵守、加强联合国，使它成为世界安全与和平的更有效工具。

不过，如果我不特别提到中东问题，便是失策之举。这问题的性质和中东的地理，均与塞浦路斯分不开。我国对此问题的立场是：任何健全的解决办法，都应该以以色列军队自一九六七年以来占领的所有领土撤出和尊重巴勒斯坦的民族权利为基础。在任何情况下，均不能纵容以武力获取领土，或认为军事占领会造成任何权利。因此，我们支持充分执行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及一切在此方面所作的努力。某些主动可能已带来一定程度的和平。然而单是没有战争并非真正的和平。如果在不久的将来仍不能找到一个全面而公正的解决办法，局势仍然是严重的，存在着后果难以估计的战争的严重危险。

现在我论到塞浦路斯问题，议程上的一个项目，曾由联合国在去年广泛讨论过。当时，我有机会向大会陈述我的国家，一个小的、不结盟和不设防的国家，本组织的一个会员国所遭受的惨痛命运。我相信：如果我把这个问题说得相当详细一点，会是适当和可以理解的，它不仅是我心中最关切的，而且也可以突出显示一些今日世界面临的比较令人不安的现实。

塞浦路斯共和国，从一九七四年一月起，由于土耳其的武力侵略，受到了分割。这个在当代可算是空前残忍和不仁道的侵略的结果是塞浦路斯领土的百分之四十——其中拥有百分之七十的经济资源——处在侵略者的军事占领之下。占该岛全部人口三分之一的二十万塞浦路斯人民被赶出他们祖先传下的家园，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内变成了贫苦难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成千上万的人民惨遭屠杀，达到了灭绝种族的规模，简直可与土耳其历史上一九一五年屠杀亚美尼亚人的情况相比。亵渎礼拜的场所，破坏无价之宝的古物，抢劫和强夺财产，强奸，以及数不清的其他罪行，构成了“阿蒂拉”行动——土耳其对它在塞浦路斯军事行动的名称——所带来的悲剧。

另外一个非常悲惨的方面是失踪的人员。有二千以上的人失了踪。现有的证据显示：停火生效以后还有许多人在土耳其军队的控制下活着。有些人在被土耳其部队掳去时拍下的可靠的照片，曾经在包括土耳其报纸在内的外国报纸上及电视的纪实片上出现过。这些人的命运是怎样呢？我们曾经坚持地和再三地向土耳其方面提出这件严重的事项。但答复是：无论在土耳其或塞浦路斯的占领区都没有扣留人犯和人质。果真如此，我们是否将得到一项结论，认为这些人在被掳后不久都被冷酷地杀害了呢？对这一点，一直没有答复；但失踪人员的家属经常在痛苦中，不知道他们所爱的人还在活着或是已被杀害。我们曾经要求土耳其方面准许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进行探寻行动，给它们行动自由来寻找这些人，至少是找出这些人的埋葬所在。但迄今为止，答复都是否定的。对这件事必须进行

充分调查并弄清楚。我国代表团将向大会的有关委员会提出这件事项，以期获得失踪人员命运的情报，这至少可以减轻他们家属的痛苦。

土耳其在塞浦路斯的行动是悍然违犯国际法和人权的一切概念。大会去年讨论了塞浦路斯问题，同时，经过不结盟国家的提议，一致通过了第 3212(XXIX) 号决议，我们对这些国家深深感激。那个决议定出了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的轮廓。在它的关键性规定中，它要求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地位；要求一切外国武装部队迅速从共和国撤退；要求停止一切外国的干涉；并要求采取紧急措施安全遣送难民回家。

大会的这个决议经安全理事会以其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第 365(1974)号决议加以赞同，从而使该决议的执行成为强制性的。

土耳其对这些决议的态度是怎样呢？一年后的记录上又显示了什么呢？它的态度一直是藐视地不顾和不遵守这些决议的任何规定。不论是迅速或不迅速，外国部队一直没有撤退；不论是紧急不紧急，遣送难民回家的措施一直没有采取；外国的干涉一直没有停止，同时对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地位一直没有尊重。尽管事实上土耳其也曾投票赞成大会第 3212(XXIX) 号决议，一切还是如此。土耳其在投票赞成时，只是伪装和大会一致罢了。

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的各决议也规定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代表进行谈判，自由地达成政治解决。谈判首先在塞浦路斯进行，自今年四月以来改在维也纳和纽约进行，而且确实是在秘书长亲自主持和指导下进行的。我所非常遗憾的是，到现在为止，这些谈判没有产生任何肯定的结果。这完全是土耳其对会谈采取否定态度造成的。

从一开始就显然看出，土耳其方面根本无意进行切实的谈判。土耳其是利用会谈的时间来巩固它对占领区的控制，制造更多的“既成事实”。土耳其通过它的工具土族塞人领袖，采取了一系列的专横措施：单方面宣布所谓“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然后成立一个“制宪大会”，起草了一个“宪法”，并举行了一次对宪法的“全民投票”。

所有这些专横措施，都是在谈判期间推行的，特别是在土耳其政府收到秘书长正式发出的普通照会后推行的，这件普通照会询问土耳其政府采取了、或计划采取什么步骤去执行安全理事会第365号决议所赞同的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但是，土耳其回避这个问题，始终没有答复。

土耳其政府这种举动，又一次证明了它对谈判没有诚意。还应该指出的是，在土耳其军事占领的经常压力下，本已无法按照上述各项决议“自由地”进行谈判，何况土耳其又制造了许多“既成事实”。

不可忽视的是，如果谈判双方的目的是矛盾的，那就很难有希望取得任何肯定的结果。土耳其的目的不是遵守联合国各决议，维护塞浦路斯为独立的、领土完整的国家，而是要分割塞浦路斯。在此我要讲清楚，我不反对谈判，相反地，我相信谈判是和平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可是，谈判要有成果，就必须按照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各决议的明白规定，切实地去进行。我所指的是土耳其对谈判的态度，而不是指土族塞人代表的态度，因为土族塞人领袖完全是依赖、听命于安卡拉的。

土耳其对谈判的没有诚意，以及他的真正意图从一件事实就可以看出来：土耳其正在有系统地把数以千计的土耳其国民从土耳其移殖到占领区，住在被驱走的塞

浦路斯人的被霸占的住房和产业里。大家会记得，在数量上，土族塞人是只占百分之十八的少数民族，而希族塞人是占百分之八十二的多数民族。土耳其的这种殖民办法，是别有居心的，它要改变塞浦路斯悠久的人口面貌。

这些事实证明了土耳其的态度，也暴露了土耳其的意图。土耳其一直把塞浦路斯的状况说成是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之间的争执。但是问题的实质却是土耳其的侵略和土耳其继续军事占领着大片的塞浦路斯领土。我不得不说，在土耳其的武力迫害下，不仅希族塞人遭殃，大部分的土族塞人也遭殃。塞浦路斯人民只要有自由，只要不受外来干涉，就很容易解决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的任何分歧。

土耳其宣传中还企图散布，特别是在回教国家中散布一种谬论，说塞浦路斯问题的根源是宗教。这完全是无稽的。在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的磨擦里，宗教从不是原因。

为了力图减少对塞浦路斯进行侵略和迫害在世界舆论上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土耳其又胡说八道地声称，在一九六三年以来的十一年里，土族塞人一直受着政府的迫害，土耳其诬指政府剥夺土族塞人的行动自由，并加以种种压迫。事实上，土族塞人所受的迫害，是他们的领袖根据土耳其的分裂政策而施行的限制所造成的。在他们的领袖的压力下，大批土族塞人被迫从本乡迁去围地里，不准同希族的同国人有任何来往，对他们的经济生活和日常生活产生很坏的影响。这些事实都在这几年秘书长的报告中写得清清楚楚，有案可查。土族塞人还不准参与国家公务，这也是分离主义的一种手法，为最后的分割铺路。土耳其分裂塞浦路斯的计划见于土族塞人领袖对联合国调查专员加洛普拉佐博士的提案里，普拉佐博士把它列在一九六五年的正式报告里。

塞浦路斯将来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正面临存亡绝续的关头。只要土耳其武力仍然占领着塞浦路斯的部分领土，土耳其就继续进行着对塞浦路斯的侵略。联合国不应该容忍这一情况，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彻底恢复塞浦路斯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也许有人说应该寻找妥协的办法。当然，就许多事来说问题和争论是用妥协来解决的，但是，决不能在基本原则妥协，尤其是在涉及独立和领土完整原则的时候。塞浦路斯是一个肢解性侵略行动下的牺牲者。除非妥协的意思就是屈膝于使用武力造成的既成事实，否则在牺牲者和侵略者之间能有什么妥协。在我们这件事上，我认为以侵略成果和有关严重犯罪行为为基础的妥协是不道德的。这种不道德的行为绝不能使它合法化。

土耳其断言，它侵略塞浦路斯是根据保证条约，有权恢复被一九七四年七月政变推翻的宪政秩序。土耳其同英国和希腊的确是塞浦路斯的宪法、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保证国。在这里，我不想讨论是否保证条约赋予它这种以军事干涉塞浦路斯的权利。不管怎样，土耳其自己的行动已破坏了它保证要维护的那个目标。安卡拉现在提到新现实。新现实是什么？就是要希族塞人承认和接受由土耳其军事占领塞浦路斯百分之四十的领土，二十万塞浦路斯人流离失所，以及由使用武力造成的其他情况。

土耳其方面甚至提出，用这些以暴力造成的事实取代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的各项决议，并以之为借口拒不遵守决议的强制性规定。可是，违反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各项决议，使用武力造成的事实，绝不能取代这些决议。

土耳其的军事干涉也据说是为了保护土族塞人，维护他们的权利。但是，从土耳其运来人口把占领区殖民化，大量洗劫财物运往土耳其，这些都与保护土族塞人毫不相干。正好相反，这些行动显然违背了土族塞人的利益。我想土耳其并不是真正关心土族塞人的福利。土耳其表面表示关心，只是作为推动它扩张主义计划的借口，而土族塞人不过是土耳其在推行这些计划时所操纵的不幸棋子而已。

土耳其外交部长在大会发言时，多次提到土耳其政策背后的“地缘政治学的”考虑，这正表示出这种扩张主义的政策。大家都知道“地缘政治学”这个名词是纳粹用来为他们的侵略性领土扩张政策辩护的借口。早在一九五四年，当土耳其总理和外交部长宣称塞浦路斯是土耳其大陆的延伸部分，基于地理邻近的理由应该归还土耳其时，土耳其以地缘政治的理由想扩张到塞浦路斯的企图已昭然若揭了。

土耳其外交部长在他的发言中提到第 3212 (XXIX) 号决议，但只提到决议中关于谈判的规定，好象决议中没有其他主要而紧急的规定似的。因为对他不适合或是不方便，所以他就没有提到决议中要土耳其负责执行的让难民回返家园和停止军事干涉这个重要而紧急的部分，也没有提到在这些方面土耳其打算要怎样做。正好相反，土耳其外长所作的提议都是与决议及其宗旨不相容的。他的确要求塞浦路斯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但是，这只是口头上说得好听，企图把人引入歧途。因为土耳其在塞浦路斯的行动比它的言词更响亮。

我深信塞浦路斯是不会任凭侵略者来宰割的。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决议绝不可成为形同虚设的规定。

我来到这个崇高庄严的机构，为的是要寻求联合国针对当前悲惨局势的需要而采取的紧急有效措施。

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的执行，是安全理事会第365(1974)号决议所赞同并使其具有强制性的，这对于积极朝向达成公正和平地解决这个问题的进展是绝对必要的。我深信大会将会了解到采取朝向达成这种解决的有效步骤是明智的。

处于联合国的时代，当大家协同致力于使全球普遍遵行国际法和维护国际秩序时，让本组织一个小会员国的独立遭到扼杀是不可思议的。如果发生于塞浦路斯的这种情形可以容忍，将会为其他的小国，特别是不结盟集团中的小国制造一个危险的先例。我们不应加以忽视的是，所涉及的问题不仅是一个小国的前途，而是下列更广泛的问题：就是根据宪章维护国际安全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联合国所关切的首要问题，本组织有没有意义也要看这个问题能否得到解决。如果对塞浦路斯的悲惨局势仍然不加以挽救，这就等于向全世界说：“只有暴力才能获得胜利”。

我曾在前面说过，我相信谈判是达成和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一个适当可行的手段。我深信，如果这种谈判可以本着善意和诚意，以及在不受外部的压力和影响之下来有意义地进行，就可在第3212(XXIX)号决议的范围内产生正面的结果。我热切地希望，希土两族塞人可以象他们过去许多年来那样和平合作地相处，共同享受他们国家的进步和繁荣所带来的利益。强制迁徙人民和交换财产是不人道的，而且对双方都有害。凡是愿意迁居到塞岛其他地方的人都可以自由地这样做，但重要的是，如第3212(XXIX)号决议所明确规定的，不得侵占财产，以及凡是愿意回到自己家乡的人都可以安全地回去。

如果象我所希望的，可以在普遍接受的准则的范围内为一个可以生存的国家达成了解决办法，这种解决办法应受到塞浦路斯内外所有的人的尊重。在这方面，

我们应该从以往的经验吸取教训，而且这种解决办法应得到广泛有效的国际保证。我们需要持久的和平，可是持久的和平不可能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之上，而应建立在通过互相尊重、互相了解来运用理性的基础之上。这样，位于三大洲之间的塞浦路斯，就可如它加入联合国时所期望的，成为整个区域团结的桥梁。

在我们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当大家逐渐认识到国家与国家之间需要彼此了解、团结和合作，而且通过联合国朝着这个方向采取建设性行动的时候，在象塞浦路斯这样的小国内，竟基于种族的考虑而将这么多过了时的分离主义和分裂因素强加在塞浦路斯的人民身上，这种现实是令人感到沮丧的。

我一贯朝着促成希、土两族塞人之间的协商、合作和团结来努力，我将本着信念坚持采取这个路线。我了解，对大多数土族塞人来说，他们心里共同希求协商和合作的愿望并不亚于希族塞人。甚至在当前的形势之下也存在着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在许多情况下都会流露出来。

我深信，在一个独立的、免于暴力威胁和一切外来干预的不结盟的塞浦路斯境内，它的人民——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能够和谐相处，互相尊重对方的合法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军队的存在既无需要，也达不到任何目的。在这方面，我愿声明，塞浦路斯政府支持一个彻底非军事化的塞浦路斯国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塞浦路斯政府随时准备完全解散它的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

驾乎人类智慧的一切成就之上的便是决定地球上人类命运的人类灵性。由于技术上的巨大进步，我们显然需要生活行为方面的道德原则，以便保证人类继续生存下去。联合国宪章在国际级次上，为这种生活行为订出典范。我要谦诚地说，塞浦路斯在所有场合始终赞成服膺宪章并将坚定不移地遵循那个途径。

但愿上帝指引我们大家走上正路，因而我们可以成长茁壮，摆脱过去的一切而以真理、正义和仁爱来作为我们各项决定的准绳；因而我们可以听到圣灵的呼唤，寻求摒除私欲的智慧并且凭借原则的力量来掌握种种情况，从而永久的公正和平能在我们的地球上得到实现。

在结束我的讲话以前我再次要对秘书长为我国作了一切努力，表示我们衷心的感谢。我并要向在塞浦路斯履行任务时作出宝贵服务的秘书长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韦克曼—穆尼奥斯·路易斯大使以及秘书长在纽约的通力合作者古耶尔先生和厄克特先生正式表示热烈的感谢。

对于联合国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指挥官普雷姆·钱德将军以及他属下的官兵，我们亦要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他们在联塞部队行动和人道主义工作方面都以卓越的精神执行艰巨的任务。

对于向联塞部队提供军事和警察特遣队的那些国家和通过捐款使得联塞部队能够发挥作用的那些国家，我们亦要致以非常的谢意。

我也要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致谢，因为他作出了减少塞浦路斯人民痛苦的可作榜样的人道主义工作，同时我要向在这方面提供捐款的那些国家和组织表示谢意。

对于在这次大会的辩论中和在其他国际场合中支持塞浦路斯事业并表示关心塞浦路斯人民的困境的那些代表团，我亦要向它们特别致敬。在这方面，我要特别一提今年五月在金斯敦举行的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和今年八月在利马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因为它们对于使塞浦路斯问题获得公正解决都全力支持。

主席：我要代表大会谢谢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刚才发表的那篇重要讲话。

当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由秘书长和我陪同离开大会堂时，请各位代表不要离座。

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经陪同离开大会堂。

议程项目 9（续前）

一般性辩论

盖里先生（格林纳达）：我带着无限的欢忻和感激的心情，荣幸地接受向这个庄严的大会发表演说的特权和快乐。主席先生，请让我郑重地向你表示，我的国家和政府以及我本人，对于你荣任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届会议主席一职，都极为高兴。的确，我们都很充分地了解到，各方对你的极端的尊重，国际人士对你的当之无愧的尊敬，特别是对于你在担任公职的整个时期里所显露的才智和非常的政治家风度的尊敬。请接受我个人和我国家及政府最热烈和真诚的祝贺，格林纳达是一个小国但却美丽无比，因而有“香岛”之称，而它的人民都是出名的友好和热情的。

你的前任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阁下，主持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和第七届特别会议的各项工作和活动，他很有才干应付这项艰巨的工作，如果我不把我国家对他的赞赏放在记录里，我就认为我是有失职责了。说到这里，我也要对我们所爱的、卓越的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表示热情的称赞，由于他坚韧不屈地献身于和平及正义大业的精神，已使工业国家的领袖们了解到发达较差各国的需要，从而达成更大的了解和有效合作。

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莫桑比克三个国家在本届会议已被接纳为正式会员国，我要趁这个时机热烈欢迎它们。的确，这三国政府和人民必然会因加入联合国而自豪，它们同时也会感到愉快，因为它们可同世界各国开始交往，可享受特权但因而也担负起各种责任，这种情景是和一年前我们加入联合国时相同的。无

论何时无论何地，为了使我们的兄弟姐妹们从殖民主义压迫或少数统治中全部地、不受拘束地和无条件地解放出来并且加入这个世界人民大会而——双边地或单边地采取的每一步骤，都使我感到特别愉快。

我国在这个庄严的大会在第二十九届会议以及目前在第三十届会议期间特别关心的各领域里，作出了肯定的贡献。我提到的是同人权目标有关的同人权目标不可分开的妇女地位平等问题。我们的哲学一直是，男女以同等伙伴的地位来充分参加管理我们国家的事务。这是我国政府的特定政策，反映在所订的各种法律上面，而这些法律使这个原则牢不可破而且深入人心。在我们有限的财力范围以内，我们已在国际妇女年努力执行本组织所建议的各种方案，这些方案会促使农村妇女来参加各都市中心所发动的工作和活动。我们已通过我国政府设立的一个委员会的工作，在需要改善的各领域内设法进行研究，而政府将根据委员会的建议，采取进一步行动，以便使妇女在教育和训练、法律、政治、就业、社会情况、各种体育和娱乐活动以及其他一切方面都得到甚至更其公平的待遇。我有理由自豪地说，格林纳达的公民是生活在一个和平共处的融洽境界里，而我国人民都在一个美丽无比和居民友善的国土里，享受最充分的自由。

当格林纳达厚承联合国接纳为正式会员国时，它曾保证承担宪章所规定的一切义务。这些义务是同样地落在本组织每一个会员国的肩上，因此，当我们在格林纳达大声疾呼支持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人民的时候，我们只是为良心所驱履行我们对联合国宪章的义务。可是，我坚决认为这个义务不能仅由格林纳达来担负，而应由联合国全体来担负。因此，我促请联合国接受它在宪章范围内的义务，来确保南非政府和史密斯政权分别地充分遵守大会各决议中所规定的使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人民获得自由的决定。

很清楚，这个问题并不是南非和纳米比亚之间的问题，也不是史密斯政权和津巴布韦之间的问题，而显然是南非政府和史密斯政权两者同联合国全体会员国之间的问题。联合国是否必须继续推诿它的责任、宽恕不准这两国人民获得自由的行

径，并满足于对大会的尊敬和信心可能大受影响而一天不如一天呢？还是，我们在目前就应该采取行动——我指的是足以使南非和史密斯政权都让道理的切实有效的步骤——使这两个国家中的兄弟姐妹们获得自由，并使全世界人民都继续尊敬这个大会——联合国。

我愿重申我国对领土完整原则的不可改变的立场。关于这一点，我促请联合国立即采取各种步骤，来执行第1514(XV)号决议，并确保伯利兹国人民摆脱殖民统治，获得充分独立，他们长期的愿望由于非他们所能控制的力量和环境而受到了挫折。

这不一定是说，格林纳达是反对谈判的。可是，如果一个人信奉各国人民须有自由的原则，认为伯利兹的人民的利益至高至上，并客观分析联合国对世界人民的义务，他就必然会极力主张，伯利兹人民应有权享受充分的独立以及因独立而发生的各种权利义务。如果我们在联合国中推诿我们依联合国宪章所负的责任，那么必然的结果是，不但我们会问心有愧，而且世界和平还可能受到危害。因此，我们要求现在就让伯利兹人民获得充分独立，我重复说一句，现在就独立。★

民族自决的固有权利和经济生存原则是紧密连结，不可分开的，特别是对以前的殖民领土而言，因为它们的经济资源过去曾受帝国的主子的剥削，现在独立之后，就必须设法养活自己了。

我在许多场合里，曾提到若干国家——例如我自己的国家——在获得独立后所面临的经济困境。只在几个星期以前，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举行年度联席会议时，提到这个问题。我承认这不是一个公开讨论这个问题的最后场所，因为联合国已经明智地提供了一个国际法院，由于这个问题涉及法律方面，国际法院更能适当地予以处理。

☆ 副主席萨法尔先生（巴林）就主席位。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蒙特塞拉特特派团的报告强调，当殖民地获得独立时必须从殖民国家得到经济保障。该委员会这点意见强调格林纳达说了很久的一点，就是，政治独立之后，一定要在经济上能够生存。

现在并有改轻我们的忧虑的迹象，因为我们对于此事的想法已经反映于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其中规定所有遭受外国占领、外国和殖民统治或种族隔离的国家、领土和民族“对于其自然资源和所有其他资源受到的剥削、消耗和损害有权要求偿还和充分赔偿”，（第3201（特一六）号决议，第4段(f)）。

也许由于联合国的影响力，和我国家同帝国的殖民国家之间业已开始的双边谈判，我希望不必象打算那样，把格林纳达的具体问题提交国际法院。

鉴于国际大家庭越来越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平等问题，我们坚决支持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就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以更公平的方式来调整贫富各国的经济关系所采的积极立场。因此，我们促请所有会员国进行合作，以便早日执行旨在改善全人类经济情况的各种措施。

就某种意义来说，本届会议是历史性的，颇为重要，因为它标志本组织成立第三个十年的结束。回顾已往，情绪上不禁有一种哀乐交集的感觉：一方面为某些事有了成就而感到欢乐；他方面，则是对于下列事情感到悲伤：国际战争、各种冲突和攻击；发展中国家借以得到一些援助的有限度合作所引起的附带条件和官样文章；贪得无厌和野心勃勃的较大国家对较易受其影响的发达较差国家的某些人民所加的恐惧和忧虑。换一句话说，我们确实能以哀乐交集的感觉和情绪来真实和忠实地回顾联合国过去三十年的活动。

但就其他理由交说，本届会议也是历史性的，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届会议迎来了新时代的黎明——在这个时代里，存在着一种“世界秩序”，特别会带给第三世界一种希望，而同时会使人对人类努力的各方面——医药、技术、人类关系、社会科学和研究以及其他各各方面——寄以更大的希望和信心。人类为了获得更多知识和进步起见，正在勘探空间实际上他们曾在空间步行；的确，人类甚至还横跨了

月亮的表面。人类一直在，而且目前还在，勘探着我们海洋中无穷的财富和潜力。

就是鉴于这种情况，我请求大会让我在这里重复我几个星期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年度联席会议发表演说时表示的意见。那时我说过：

“世界各地都有真正的伟人。使一个人成为真正伟人的，不是他的出生地点、出生地点的大小、也不是出生的家庭或是他的肤色。事实上，那些使人成为真正伟大的品质很少会在书本中或教室里找到。毫无疑问那些崇高的品质，是藏在人类意识的最深处，只有他，只有他一个人，才能发现。但遗憾的是，普通人却怕开门发现自己。”

这一事实使我大大明白，联合国组织现在必须认真考虑并发动设立一个适当的部门或机构、专门从事心灵研究。我当然不会这样幼稚连这个问题的灵敏性都不知道，可是我认为确有各种理由来进行心灵研究，尤其当我们想到人类丰富的智慧由于他不懂得当时环境的若干方面和更不懂得神秘的自己或灵魂而未被充分利用，尤其当我们想到各种无法解释的现象甚至使各种最先进的科学都继续无法提出答案时，更觉得要这样做了。“百慕大的三角”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为了各种理由，我认为在这个阶段只要宣布需要设立这个部门或机构就够了，不须对此详加阐述。可是这绝不应使人低估这个革新题目的重要性。从这种心灵研究所得的知识，极其可能使人类成为他自己和环境的绝对主人，而不是它们的受支配者或以有些人来说它们的奴隶；我们需要一个专门从事心灵研究的部门或机构。

在结束时，我要极坚决地说，我确实相信全世界，更确切的说，世界事务的领袖，都必须对上帝——叫神、叫安拉、叫耶和华或叫其他名字都可以——的普遍性，有更多的认识和接受。是的，我们有必要承认那种权力，那种至高无上的权力；我们需要接受神，当作万物的源泉，一切创造的中心。我们需要在我们的身心内外，在我们的周围和上方、在我们的身内和身外、不但在礼拜的几个小时里而且在有生之日的每一秒钟，都要感觉到神的存在。在这里，在这个宏伟的整个大楼里，我们需要感觉到上帝的存在，实在说普天之下上帝永存长在。

我谦恭地认为，只有抱持这种概念，只有承认并接受神的普遍存在，同时感觉到他有无限力量把世间万物都永恒地联系起来，一个以和平及博爱为根据的新的“世界秩序”才可以在永久的基础下适当地建立起来；我现在请求所有在这里的人一道祈求并恳求我们万物的造主，以天主济世的精神来重新教导我们，以广大无边的威力来重新鼓舞我们。让神来感化我们；让神来指点我们；上帝赐我们以爱，那个无我无酬的爱，会鼓舞我们，使我们有新的谅解，使我们有持久的和平，使亿万万人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如果我们中间有人表示怀疑，我只能用下面这种基本哲学来安慰自己：“我们都属于同一个地球，所不同者是，有的已结了果，有的还在开花”。让我们赞美上帝。

翁莱代先生（多哥）：加斯东·托恩先生得到几乎一致的支持，当选为我们大会的主席。他那慈爱的心肠、政法家的风度、对国际事务的深刻认识、人所共知的才干都是足以使他胜任的卓越条件。我国代表团一定同他合作，给予支持。可以保证的是，本届会议的工作在他指导下必定会得到成功和大有成就。对于他作为大会主席而肩负起的崇高而非常困难的工作，我们诚恳地祝愿他成功。

我也希望借此机会祝贺即将卸任的主席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先生阁下。他卓越地指导了第二十九届常会和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的工作。

我也不能忘记提及我们那位充满活力的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这位努力不倦的和平使者不论是在什么情况下，总是到处奔跑，全心全意为确保我们组织正常地履行职务而运智用巧牺牲自己。我们将坚定地支持他，并向他表示深切的谢意。

我们又再次在这个庄严的论坛上聚合，进行对话和调解，希望尽可能一同处理这个不断转变中的世界的困难问题，寻求实际的办法，来增进国家之间更好的谅解和兄弟般的合作关系。毫无疑问，国际大家庭正在经历它历史上一个决定性的时刻。

虽然非殖民化过程还未彻底完成，但可以肯定，长久以来备受压迫和奴役的国

家的人民的牺牲并没有白费。我要表示，我国代表团非常高兴见到英勇的自由战士在艰苦的战斗中，打败反动势力，赢得了光辉的胜利。

多哥代表团热烈欢迎加入我们组织的姐妹共和国，即：莫桑比克、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佛得角；我们为巴布亚新几内亚取得独立感到欣喜，并希望该国将在短期内加入我们的组织。虽然当我们见到这些兄弟国家的代表出席我们的会议时，我们是应该感到自豪的，但是，我们不应忽略它们面临的严重和广泛的问题。多哥人民和政府及其伟大的政党，多哥人民联盟，希望再次向这些兄弟国家保证，我们一定不断支持它们努力去建立自己的国家。

不幸的是，在我们对这些事态发展感到满意的同时，安哥拉境内正在上演一幕悲剧，其种种后果难以预料，真是面对国际社会的一个重大考验。因此，我国代表团迫切呼吁安哥拉三个解放运动停止它们的内部斗争，顾全大局，消除歧见，共同工作以迅速恢复和平，从而创造有利的条件，使该国能够于十一月十一日在平静和庄严的气氛下取得独立。我们也希望大国停止干涉安哥拉的内政，因为我们深信只有安哥拉人自己才能给他们自己的惨痛问题寻求持久的解决办法。多哥代表团，在再次对新葡萄牙在前法西斯政权垮台后开始进行的非殖民化工作表示祝贺时，要求新葡萄牙尽力履行他们的诺言。

关于西撒哈拉，我国代表团重申它的信心，就是国际法院既已提出了咨询意见，西撒哈拉的接界国家和西班牙必能在适当顾及有关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合理愿望的情形下，达成一项有利于该领土未来的发展的解决办法。

关于南部非洲，我不必强调，保证个人的权利、禁止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在任何地方发生、使南部非洲人民得到独立都是我国继续不断，以真诚态度，大力促其实现的事业。为了实现这些原则，我们迫切呼吁安全理事会和各个大国彻底负起它们的责任，接受南非种族主义政府的挑战。

在纳米比亚，那些实行种族隔离的人对我们组织的决议还是置之不理，继续推行那不择手段的“班图斯坦”计划。这计划一直令我国政府感到不安。我国代

代表团在重申反对那可憎的政策的同时，要求沃斯特的种族主义政权毫不迟延地执行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和决定及非洲统一组织关于纳米比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宣言。我们重申对西南非人民组织的支持，并坚持必须使该领土人民能够行使它们的自决、独立、领土完整等不可剥夺的权利。

我们希望津巴布韦能早日得到一个宪政解决办法，把权力移交黑人大多数。对于津巴布韦的兄弟人民在非洲人全国委员会指导下保卫的正义事业，我们重申我们一贯的支持和积极的团结。

在中东，埃及和以色列签订了局部协议，使人对达成一项全面解决这个冲突的办法产生了希望。多哥代表团相信，在这些新措施之后，将出现采取其它的措施，因而，可能建立一个公平持久的和平，在不忽略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这一原则下，保证各国的生存和该区域所有人民的和平共处。明显的是，除非以色列作出最后决定，依照安全理事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242(1967)号决议和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二日第338(1973)号决议，从占领着的阿拉伯的领土撤出，这种和平是不会有有效力的。

最近在印度支那半岛发生的事件又一次证明，外来的威力不能阻挡人民把自己从压迫和帝国主义中解放出来的决心。我们欢迎印度支那人民的胜利。我们祝贺柬埔寨政府，在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英明领导下，把外来的侵略者从柬埔寨赶了出去，恢复了该国在我们组织应有的地位。多哥政府可向兄弟国家柬埔寨的领导人保证，在谋求解决他们的问题时，多哥政府将一定给予不断的支持。

我国代表团感到非常遗憾，由于一些不合理的理由，两个越南不能在今年加入联合国。那些符合我们《宪章》第四条第一项关于加入本组织的条件的第三世界国家又再次成为滥用否决权的牺牲品。否决权是一小撮富裕国家所拥有的特权。

我在大会第二十九届常会阐述了多哥政府对朝鲜问题的立场，这个立场至今并没有改变。我们坚信，要创造有利于朝鲜的自主和平统一的条件，唯一办法就是撤出所有驻在南朝鲜的外国部队，同时为此目的急切需要把停战协定改变为和平协定。

塞浦路斯问题继续令人担忧。多哥代表团曾在适当的时候表示了它对这问题的看法，认为所有外国部队无条件从该岛撤出是实现和平的首要条件。我国代表团再次表示，为了确保两族能够在同一个国家里和睦共处，希望一切在这方面的努力都会得到鼓励。为达此目的，我们将支持任何要求立即执行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第365(1974)号、第367(1975)号决议的倡议，这些决议呼吁所有国家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关于经济问题，必须强调的是，大会第六届和第七届特别会议所达成的结果明显地反映出在形成中的政策。这些政策有两个目标，一是着手处理这世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面对的各种经济上的困难，二是长期控制周期性的，或是偶然性的波动。这些波动是世界经济的特征。

国际大家庭愈来愈怀疑的不仅是它的经济制度有无能力促进物质进步和社会正义，而且是这个制度有无能力防止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发生剧变。各种不同学派对困扰着世界经济的问题的根源有不同的看法，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在这世界经济内正存在着一种不能满足我们的新社会的需要的陈旧制度，从而制造出极其混乱的局面。

把一小撮工业化国家同为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隔开的差距正日益扩大，给当前的经济危机多加了一层问题。不健全的国际金融制度是引起当前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事实上，工业化国家曾经多次蓄意地违反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庄严规则，因为它们认为自己有足够的实力避免任何报复行为。投机性的资金转移所引起的歪曲性影响、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和汇率的任意波动已使较穷国家摆脱经济和财政依赖的努力，全功尽弃，毫无结果。因此，第三世界由于自己经济增长停顿而受到损害，但是，更重要的是，工业化国家经济停止增长停顿的累积影响也使第三世界受到损害。

所有第三世界为重新安排国际货币制度而作出的各种努力都碰到了工业化国家的可耻的冷淡态度。工业化国家是极不愿意为那些帮助他们致富的人的利益而放弃他们的任何特权的。

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的第三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结果比在新德里举行的第二届会议的结果并不见得更有成效。最大的成就也只不过是设立一个二十国委员会。在这委员会，某些发展中国家取得权利参与有关改革货币制度的讨论，因而给从前只有财政大国参加的十国委员会加添上一点民主色彩。

最近的事情证实了以国家货币作为国际储备的手段的危险。因此，储备货币价值的波动，特别是购买黄金作为储备货币最后兑换手段的费用日益上涨，使人更加觉得必须想出一种没有这些主要缺点的中立手段。这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支持以特别提款权作为国际金融标准和要求在提款权的分配和它们自己的需要之间建立一种联系是正当合理的。

贸易条件的恶化和出口收入的波动严重地妨碍经济脆弱的较穷国家的发展计划。在这方面，把许多非洲的、加勒比的、太平洋的国家同欧洲经济共同体联合起来的《洛美协定》的重要贡献是提供了一个办法，以确立一种平稳商品出口收入的制度。我国认为，国际大家庭应该以这项政治意义重大的措施为榜样，努力把生产原料的发展中国家和利用这些产品的富裕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搞得较为公平，从而避免一场无意义的国家之间的冲突。

十五个东非国家，代表着约1.3亿人口，冲破了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语言隔阂，决定不再让它们区域划分为英语区和法语区，并于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在拉各斯签订了建立西非国家共同体的条约。我国因参加了缔结这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条约而感到自豪。这个条约的目的是促进签字国之间在各经济领域内的合作和发展，特别是在工业、运输、电信、能源、农业、自然资源、贸易、货币和金融问题、社会和文化事务等部门内的合作和发展，希望能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加强并保持经济的稳定性，巩固签字国之间的关系，并助成非洲大陆的进步和发展。西非国家意识到它们进行合作的努力，对于其他非洲国家在我们整个大洲和全世界促进更广泛合作的努力，不应有何妨碍。我们相信这是其他地方应当仿效的一个极好的国际合作实例。

最近，不结盟国家在利马明显地证明了，国际大家庭是需要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的崇高理想，只有缩小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巨大差距，才可以实现。工业化国家时常指责发展中国家宁可要对抗而不要对话，让一个所谓的自动多数起其作用。这是不对的，我们最佳的武器历来就是调解。因此，我们要求并且促成了特别会议的召开去研究原料、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等问题，以便达成协调一致的、可能加速实现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办法。

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建立这个新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第二十九届常会通过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第七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关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有关最后决议等都应该导使富国放弃进行经济控制的野心，从而使穷国能够从它们的自然资源获得最大的利益，以期获得它们的经济解放。

因此，本组织就其设法纠正当前的不平衡状况，从而建立一个比较公平和人道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言，已经成为发达世界和发展中世界进行交谈以消除主要歧见、调和意见、进行极重要的谈判和作出关系重大的决定的中心。

但是，要充分达成这个目标，我们必须改革本组织的经济和社会系统的结构，使本组织更能满足新兴国家的志愿。因此，大会第二十九届常会并不偶然地要求得到：

“……一个研究报告，其中应载有关于联合国系统内结构改革的提议，使联合国系统充分能够广泛地处理国际经济合作中的各种问题……”（第 3343 (XXIX)号决议）

一小组杰出专家致力于这项工作，并设法给本组织拟定最适当的办法，使本组织在抛弃这个没用的制度后能在将来集中努力于实际的发展问题，同时保持国际大家庭的团结。我们了解并赞同该小组作出的结论，其中包括提倡对联合国的中央结构进行重大改革、对经济问题采用新的处理方法，和对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进行彻底的改革。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在这个小组之后，决定成立一个大会全体的政府间委员会以策划详细的行动计划。我国代表团希望这委员会尽早开始工作，因而能在不久的将来提出报告。

在我们看来，本组织面对着艰巨的工作。要彻底完成这些工作，我们需要从所有会员国，大的、小的、富的、穷的、强的、弱的，得到更多的支持。我们大家都有责任帮助完成这些工作。

没有和平就不能有发展，而和平是一个善意问题。在和平的信徒纳辛贝·埃亚德马将军的英明领导下，新多哥非常了解这一点，并尽心竭力，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特别是西部非洲这个分区的人民之间的了解。这是我们对于实现这个国际大家庭为自己立下的崇高目标所作出的一点贡献。我希望我们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繁荣、公正、和平的更美好世界的共同愿望，会促使我们尽心竭力，确保我们组织的成功。

加尔巴先生（尼日利亚）：

我非常高兴能向主席转达尼日利亚代表团对他当选本届大会主席的祝贺。他代表的国家和地区，具有极大的潜力，能促进本组织宪章的理想和实现贫国人民的热望。我们都知道他献身于和平事业和提高人类尊严的工作，这使我相信在他明智的领导之下，这次会议一定获得重大成就。在这方面，我向他保证我国代表团的合作。

没有人怀疑，联合国和当前迫切问题的解决有密切关系。本组织在二十五周年和这次会议庆祝三十周年的这段期间，已认识到它不只对某些会员国，而是对所有会员国都负有责任。它致力于维持和平，同时也注意到有必要提高全人类的经济和社会福利，不再在这个历史性的会堂上极其庄严地发表虔诚的议论，然后很快地就忘得一干二净。它通过了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宣布了一项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适当的行动纲领。在联合国赞助下召开的世界人口会议、世界粮食会议、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大会，表明本组织进一步专心注意到各会员国的福利。此外，几天前才结束的第七届特别会议，使我国代表团深信，本组织是能够站出来迎接未来的挑战的。

第六届特别会议召开时，大家看到，有人明确地反对较贫穷会员国的热望。对贫富的明显差异，置之不理，却反而去责怪不应该受到责怪的事情。第六届特别会议使大家沉痛地认识到我们的意见不一致。第七届特别会议，凭其正面的成就，证明了有志者事竟成，这句古老格言的正确性。

另外，还要以行动来证明的是：联合国各会员国对于有必要忠于宪章所有条款的觉醒，不是“战略”一通过了就烟消云散的那种短暂的发展。我们有第一个和第二个发展十年这两个战略的经验来为这种顾虑作辩解。我们往往太容易忘记本组织宪章专以两章，共十八条，论到国际经济和社会合作问题。第五十五条规定，“为造成国际间和平友好关系所必要之安定及福利条件起见”，联合国应全力促进较高的生活程度，全民就业，国际间经济、社会、卫生及有关问题的解决。宪章第五十六条规定，本组织所有各会员国担允采取共同及个别行动与本组织合作，以达成第五十五条所载的宗旨。

因此，如果世界经济体系长期存在着悬殊现象，过错不在宪章；而在于会员国没有履行其义务的政治意志。这种意志，现在必须肯定表明其确实存在。我国代表团认为，过去两年所发生的许多事件应已明确显示：长久以来，使被压制的穷国处于绝望状态的各种条件，他们再也不接受了。如果富国察觉这些迹象，如果他们真正努力作为发展中国家加速进展的伙伴，则在实现我们宪章的序言：“免后世再遭惨不堪言之战祸”，和“促成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方面，就作了一个开端。

第七届特别会议结束时，全体一致通过了特设委员会提议的各种措施。我国代表团期望我们迅速采取行动，来实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新的经济关系制度。我们期望早日使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并使其多样化。我们望期通过提供缓冲性储存资金的安排来改进我们的贸易条件，这种安排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内的综合方案，这方案规定按指数调整价格以保持并增加我们对进口的制成品、技术和各种服务的购买力。第七届特别会议建议的转移实际资源以供给发展所需的资金

和改革国际货币制度等措施，也应该迅速实施。 这些措施对确保减让性财政资源的流动有所增加和国际金融机构更大地参与发展中国家的开发战略，都是必要的。

当然，我们并没有忘记发展中国家本身必需更有效地合作，以改进他们的经济状况。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发展中国家应该进一步合作来进行经济计划。 发展中国家中的石油生产国愿意积极地援助条件较差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确实，过去两年这些国家提供的援助，总数约为他们全国生产毛额的百分之二点二。 我们尼日利亚，虽然自己有许多内部需要，但还是对其他国家的发展过程，已提供其微小的贡献。 我们除了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双边援助之外，我们也向非洲开发银行提供大量的资金，以增加银行向非洲国家给予开发贷款的能力。 我们准备尽我们的能力继续这种过程。 我也提到今年五月在拉各斯具体表现的这种合作的努力，当时，十五个西非国家签订了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宪章。 我们希望这宪章将成为有利于所有成员国和其人民的经济集团组织的起飞点。

联合国为实施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中所规定的互利的伙伴关系，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讲坛。 同时，它也在大小国家主权平等的情形下，为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场所。 如果它要完成这个任务，它就一定要强壮而有效。 本组织创立三十周年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再次一起建设性地检查如何最好地强化本组织，从而，使它更能适应迅速变化中的世界的需要。 本组织若干大国借口宪章没有问题，这是生活在象牙塔里。 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经常批评宪章所规定的非民主体制。 通过这样的制度，有些国家可以阻挠绝大多数国家的意志。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指责发展中国家向大会强加了多数暴政，我认为这是相当不公平的。 这些指责和反指责的结局，使我们有必要对宪章加以仔细的检查。

第二十九届大会通过了第 3343 (XXIX) 号决议，内中规定成立专家小组，其任务是向大会提出一个研究报告，内载联合国系统结构改组的各种建议，使联合国具有充分能力来通盘处理国际经济合作的种种问题。 这样认识到有必要革新联合国结构使其更具有适应能力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专家小组所提报告中许多极有建

设性的建设，大家同意送请特设委员会采取进一步行动。 专家小组在其报告的引言部分指出：

“每一项重大的改革建议（与只是“修修补补”的微不足道的建议相反）必然会冲击到某些人在现状中的既得利益。 要照顾新的需要和事态发展而对于本系统作有意义的改革可能需要放弃一些短暂的利益和牢固的习惯而着重行得通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长期利益。”（E/AC.62/9，第10段）

对本组织未来的发展，能提出更好的劝告了。 大会经过长期辩论之后，通过了成立审查宪章特设委员会的第3349（XXIX）号决议，这充分证明了大会的智慧。我国代表团惋惜某些会员国的不合作态度阻碍了委员会工作的进展。 用不着详细说明，让我以下列事实来提醒那些甚至连简单审查宪章都反对的人： 第一，联合国今天有141个会员国。 其中，只有51个——或稍过三分之一——是“创始会员国”。 如果后来在宪章上签署的三分之二会员国，甚至不能鉴于经验而对它的改进提出建议，那末我们一定会觉得我们至多只是次等会员国吧了。 第二，即使创始人也认为不应该排除修改宪章的可能性： 第一百零八条详细说明修正案生效力的规定，而第一百零九条详细规定如何审议宪章。 第三，生长就含有变化。

我国代表团期待这个问题会有更积极的进展。 同时，这届大会应表示决心为更民主的体制而不懈地努力，以便更好地满足本组织所有会员国的热望。

若干因素已确实证明，超级大国不能再独占地负担国际和平和安全的责任。以裁军问题为例： 即使在宪章的宗旨里，它具有优先的地位，但由于大国之间互相勾结，它几乎已失败了。 裁军委员会会议，原来打算做为裁军谈判的主要论坛，已经逐渐瘫痪衰弱了。 这种集体努力正因超级大国之间的双边交易而受到挫折，这种交易在他们看来是进展，但对联合国的大多数会员国却是掩盖了事实的真相。 裁军委员会会议的主要功用，不是越来越入支支节节的裁军措施的长期谈判。我们大家的目标是在国际监督系统下实施全面彻底裁军。 要达成这个目标，我们必须就全面禁止试验条约达成协议。

由于在这个紧要问题上缺乏进展，对于所有其他有关的裁军问题都继续束手无策，难以处理。 这些问题就是，不扩散核武器制度，禁止一群拥有核武器国家嘲弄国家主权平等的概念；减少富裕国家军事预算的惊人开支；以及将人力和物力资源由从事军备竞赛转移到增进全体人类的经济和社会进展。

就我们来说，要是政治意志和相互信任，则对全面禁止试验制度的确定和早日通过是不应当有任何技术困难的。 在我们认识到技术和科学专家在裁军谈判所涉复杂问题分类工作方面的价值的同时，裁军委员会会议的工作不应该转到旁门小道，去进行种种有关具体裁军问题的年度讨论会和座谈会。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惋惜在第一次《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审查会议里错过了推进裁军工作的好机会。 审查会议没有达成防止核武器的横扩散与纵扩散的任务。 拥有核武器的《条约》缔约国不怀好意地不肯保证他们决不使用或决不威胁使用致命武器。 同样，核武器国家也没有清楚地承诺，他们将履行《条约》第六条加给他们的义务，去进行有意义的谈判，以完成核裁军的具体措施。 对我们当中愿意放弃发展核武器而成为《不扩散条约》缔约国的这些国家来说，核武器国家的态度已足以证实超级大国霸权所支配的世界的不公平。 所有国家都需要在主权平等的论坛上更建设性地、更有意义地面对裁军问题。 提议的世界裁军会议能够提供这种论坛。 如果召开这样的会议的试图继续受到阻挠，则我国代表团将毫不迟疑地参加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要求大会在特别会议里全力注意裁军问题。

我现在要提到大会必须采取行动的有关国际和平和安全的若干具体政治问题。

去年，解放战斗在印度支那和非洲都有了非常令人惊讶的进展。 越南人民再次宣布他们的独立，现在可以期望取得他们在这个庄严大会的合法地位。 我国代表团希望不久就能够拆除阻止两个越南入会的障碍。 寮埔束也成立了人民政权。 我国代表团很高兴，寮埔束人民现在能够利用它们的力量来重建国家和恢复受战争摧残的经济。 我们欢迎他们回来和我们在一起。 我们也满意地注意到巴布亚新几内亚获得独立，同时，盼望欢迎这分新国家加入联合国。

在非洲，通过解放运动长期的斗争，和所有反对压迫力量的支持已发出对葡萄牙牙殖民主义进行战斗的呐喊。随着几内亚比绍参加这个主权国家社会的光荣榜样之后，莫桑比克、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也在本届会议里加入了联合国。我们再次祝贺这些新国家所取得的成就，同时，盼望和他们密切地合作。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群策群力，援助这些新国家，由于长期的殖民统治，他们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以及佛得角，迫切需要援助，以应付因安哥拉局势而流离失所的难民大批涌入的情况。我国代表团希望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会采取适当的、迫切的行动，为这个人道主义问题找到解决办法。

我们原曾满怀希望，期待安哥拉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同时成为本组织的会员国，但是令人遗憾地，它现在却进行着骨肉残杀的战争，削弱了元气，无法从事建设事业。尼日利亚政府对煽动一群安哥拉人的行径，强烈表示痛惜。我们最严肃地，同时以人道的名义呼吁安哥拉局势的外来干涉者放手离开，让安哥拉人民有机会安定下来从事建国的艰巨工作。尼日利亚政府决不接受现在这样被支解的安哥拉。我们相信安哥拉存在的问题一定都能够在统一的安哥拉国里获得解决。因此，我呼吁安哥拉的领导人把安哥拉国和人民的利益放在党和个人的利益之上。我衷心希望安哥拉各领导人将会充分表现出政治家的风度。如果不久能够欢迎统一的、和平的安哥拉加入我们中间，我国代表团一定非常高兴。

尽管非殖民化工作有所进展，但是帝国主义仍然是南部非洲的国际和平和安全的最大威胁。在消灭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以前，还必须克服一个巨大的障碍，如果要举个例子的话，津巴布韦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津巴布韦白人反叛集团灵巧地运用政治手腕，加上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帮助，几乎成功地诱使国际社会怀着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我们几乎受骗相信，反叛集团终工察觉这个迹象，认识到他们的愚蠢政策行不通了，决定采取必要步骤，以便确保他们自己和子女，同长期受他们压迫的土著人民维持着和平和有意义的合作关系。令人遗憾地，依恩·史密斯再次表明他决心破坏所有和平转移权力的可能性。他破坏他这个非法政府和非洲人全国委员会

间的会谈，进行危险的把戏，企图分裂民族主义者的联合阵线，设法和部落酋长会议的傀儡们进行会谈，伊恩·史密斯自己正招来更加激烈的武装斗争，其最终的下场是毫无疑问的。

联合国既然了解到伊恩·史密斯是背信的、靠不住的，就应该对津巴布韦的民族主义运动给予绝对的支持和鼓励。尼日利亚联邦军事政府保证给予坚决的支持。同时，我国政府呼吁非洲人全国委员会紧密团结，抛弃微不足道的猜忌和个人野心，团结一致，全心全力，使他们的祖国摆脱白人反叛者的压迫。

纳米比亚局势继续恶化。南非不仅公然反抗联合国；它甚至拒绝依照安全理事会第366(1974)号决议的要求，公开宣布它将遵守本组织的决议和决定。此外，南非通过班图斯坦的建立，坚持使纳米比亚巴尔干化的凶暴政策。在允许领土内的白人和黑人种族集团不受干涉地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的借口下，沃斯特政权继续不断地对纳米比亚进行压制。整个世界组织怎么可以束手无策地坐视南非继续公然地违背本组织的宗旨呢？纳米比亚人民满怀希望地期待联合国承担起责任，他们的耐心几乎已经用尽了。我们是不是继续使他们失望呢？或者我们要比以前更坚决地对付南非，迫使他们由纳米比亚撤退呢？我国代表团相信，如果我们有政治意志，我们能够在短期内解决纳米比亚问题。

某些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坚决主张，南非非法地占领纳米比亚所造成的局势并不威胁到国际和平和安全，这种主张是犯了多重标准的罪过。纳米比亚局势能在需要长期和平才可从帝国主义剥削下恢复过来的一个大陆上触发种族战争。因此，我希望那些使用否决权阻止对南非采取有效行动的国家，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同时认识到，根据宪章他们对整个世界负有责任。

大会在去年第二十九届会议里明智地通过了第3207(XXIX)号决议，其中大会鉴于南非继续违背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要求安全理事会审查联合国和南非的关系。可惜，由于若干常任理事国使用否决权，安全理事会不能作出任何决定。这件事以后发展到排除南非进一步参加那届会议的工作是众所周知的。

不过，有趣的是，南非现在已加强其宣传运动来放映一个自由化过程的幻影。我们都知道，事实的真相是一无改变。种族隔离最可厌恶的地方仍然到处可见。种族主义政权没有开始和黑种南非人平等地进行必要的接触，却宁愿和独立的非洲国家进行所谓的对话。沃斯特不与生来是黑的南非同胞对谈，但却愿意和其他地方的黑人领袖喝酒、吃饭、甚至秘密拜访他们。这种极端的虚伪作法是想在非洲统一组织里制造混乱，我们很高兴，今年四月在达累斯萨拉姆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级特别会议里，这个阴谋被揭穿了。特别理事会会议通过的达累斯萨拉姆宣言肯定了首先发表于卢萨卡宣言的非洲立场，就是只有放弃种族隔离制度，南非和非洲大陆的其他国家之间才有可能建立友谊。如果坚持能够开始同南非目前的领导人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就是出卖该国受压迫的非白种人。

尼日利亚联邦军事政府承认各国对具体问题拥有决定政策的主权。不过，联邦军事政府也相信，若干不需证明的事实应该使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对种族隔离制度这种绝不容于宪章的问题，采取一致的立场。一边说反对种族隔离制度，而同时又和全然立足于种族隔离制度的政权维持外交、经济和其他形式的联系，这完完全全是自我欺骗。甚至更严重的是，本组织某些会员国继续对南非供给保护和持续这种可憎的制度所需的各种武器。因此，大会职责所在，一定要强烈地重申对南非实施进行武器禁运，同时，要求终止和南非的经济勾结以及所有其他形式的接触。我国代表团希望把它赞赏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特别委员会不懈地努力暴露种族隔离制度的种种罪恶的意思列入记录。同时我们希望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全心全意地参加有效地消灭种族隔离制度的伟大任务。那些目前选择和南非进行或加强接触和合作的人要当心。

我国代表团非常关心，塞浦路斯问题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忧虑此时此刻一个弱小的不结盟国家的利益会成为强权政治祭坛上的牺牲品。这个岛国目前的危机是由于邻近大国的政治和领土野心而引发出来和持续下去的，他们表面上装作在保护塞浦路斯两族的这族或那族。全体塞浦路斯人民一定要认识到，他们首

先要效忠于塞浦路斯，而不是他们祖先在希腊或在土耳其的家园，在那以前，外人总有机可乘，在塞浦路斯混水摸鱼。尼日利亚对大国强迫解决弱国的问题，没有信心。我们宪章所载各国平等的原则和强加的解决是正相反的。我们注意到两族间的恐惧；但是，我们不赞成那些宁愿分裂塞浦路斯的人的立场。这个年青国家必须保持领土的完整。大会必须再次呼吁塞浦路斯问题直接有关各方表现建设性的政治家风度，同时根据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大会将再次面临尚未解决的中东问题和与其密切有关的巴勒斯坦问题。去年我们把这两个问题分开讨论，这或许是我们第一次表明了我们充分认识到这个地区长期动乱所造成的人类悲剧。巴勒斯坦人民被迫丧失了他们的家园，而要重新安置他们，不是在难民营里，甚至也不是在兄弟的阿拉伯国家里，而是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重新安置他们，这已经成为了这个地区寻求有意义的、持久的和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要素。第二十九届大会请亚西尔·阿拉法特发表演说，是有点过迟地注意到这个问题。之后，大会进一步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勒斯坦人民真正的声音，在这个大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里取得了荣誉的席位。我国代表团相信第二十九届大会的这些发展是迈向和平的不可缺少的步骤。巴勒斯坦人民必须和这问题的解决有密切的联系，他们将在这种解决下生存过活。

可惜，中东局势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威胁仍然继续存在。情况的捉摸不定是该地区英雄的人民进行建设性努力的严重障碍。即使在创造条件以促成和平接触上有了某些进展，但重要问题仍然还没解决。我国代表团相信中东的种种复杂问题上的任何突破都是寻求和平的一个步骤，应该加以欢迎。对一个复杂问题采取毫不通融的态度的价值可能同蔑视联合国的种种决议和反抗真正寻求和平的种种努力的傲慢态度同样令人怀疑。因此，虽然我们赞扬最近签订的协定，我们必须强调要获得持久的和平还需不断的努力。以色列必须正面表示愿意放弃蔑视的态度，同时，根据联合国的种种决议进行谈判。七月在坎帕拉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最高级会议和八月在利马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通过的决定比以前更生动地表明了本组织许多会员国对以色列的好意。以色列有机会报答这种好意，

从而确保自身和其人民在公认疆界内的和平。在这届大会里以色列抱持更有建设性的态度是有益于国际和平和安全的；更重要的是，这也是有益于以色列国的。

在我开始发言时，我广泛地提到本组织对各会员国经济发展的重视。这种重视，久被忽略，同我们宪章的理想是符合的。在旧金山的历史性聚会，联合国诞生了，以后这三十年里，少数富国和多数穷国之间的悬殊差异变得愈来愈显著，因而已到需要采取紧急行动的地步，以免经济悬殊差异激起的公开敌对态度危害到国际和平和安全。本组织各会员国在他们的能力范围内有办法，同时我希望有决心，创造种种条件使人人都过适当的生活方面取得惊人的进展。评断联合国的成败，将看它怎样把这件任务和同样重要的维持和平及促进自决和人类尊严的工作成功地结合起来。不要让人家说我们有能力使本组织满足人类的热望，但我们却沉迷于我们自己偏狭的民族利益，而不致力于全体人类的幸福。

主席：有一些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大家记得，大会第二三五三次全体会议决定行使答辩权的发言时间不得超过十分钟。我现在请那些想要行使答辩权的代表们发言。

基尼恩先生（乌干达）：我要求发言，以答复美国代表昨天在这个大会堂里对我国元首、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乌干达总统伊迪·阿明·达达元帅本人所作的诬蔑。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米切尔先生昨天在他的发言中攻击乌干达总统阿明并大放厥词说什么在乌干达有人失踪了。他的指控是以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提交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报告为根据的。如果那些派他来这里说话的人给了他正确的情报，或者出席日内瓦会议的美国代表关心地告诉他一些情况，他就会知道严格规定人权委员会工作具有机密性质的那些规则，因而也不会到这里根据一个还在该委员会审议中的报告提出他的各项指控。

不过，既然他选择这样干，我也别无其他选择，只好把事情说个清楚。人权

委员会顺利地于今年二月举行了会议，审议了载于国际法学家的报告中的第三部分指控。我说第三部分是因为第一和第二部分（这两部分断言乌干达存在着种族主义并且司法机构已经瘫痪了）被认为毫无根据，因此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小组委员会一级上就不加讨论了。我愿通知这个庄严的大会，乌干达曾经表示愿意同人权委员会合作，以讨论关于乌干达的项目。为此，乌干达曾要求推迟对关于乌干达的项目的讨论，因为在那个时候，一个调查所谓有人失踪的事件的独立的委员会的工作还没有结束。这个委员会是乌干达总统于一九七四年六月设立的，由一位非乌干达公民的高等法院法官穆罕默德·塞义德法官担任主席；他来自巴基斯坦，二十年来一直住在乌干达。他提出报告后不久便到英国休假去了，刚在两个星期前才从英国回来担任乌干达首席法官的职位。这个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是：(a)调查并确定那些据说是失踪者的身分；(b)确定这些人是否死了还是活着；(c)至于那些相信在乌干达国外居住的人，尽可能查明可以确定的，使他们离开乌干达的理由和情况；(d)至于那些已经证实死了的人，确定他们是怎样死的，在何时、何处死的，以及在何种情况下死的；(e)确定是否有任何个人或组织或法人，不论是在乌干达国内还是国外，对导致失踪人士下落不明或死亡的犯罪行为应负责任，并确定应如何处置对这种失踪或死亡应负刑事责任的人；(f)在顾及一九七三年的第二十号法令的各项规定的情况下，确定如何处理失踪人的事务及其家属的问题以及(g)决定政府应当如何去终止在乌干达使人失踪的罪行。

委员会在乌干达各地搜集证据并从乌干达国内和国外收到了各种宣誓书。现在让我引述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如下：

让我们用下述的话来开始吧：我们找不到任何证据——即使是极细微的迹象也好——证明阁下曾经下令使任何人失踪或把任何种族集团消灭。不管国际宣传媒介怎么说……我们相信，也不惜重复地这样说，我们只是根据我们所拥有的证据来工作的。”

委员会查明只有308人下落不明，其中大约有四分之三是属于保安部队的。该

报告指出失踪率最高的时期是在一九七一年的第一季度，那就是在军事接管之后不久，许多人基于政治理由而互相残杀的时期，和一九七二年第四季度，那是游击队侵犯乌干达的时期。

可是，我们对美国代表根据一份由一群从来没有到过乌干达的人编写的报告来诬蔑我们是一点也不感到惊奇的。总之，我们定于今年年底之前将乌干达的答复送交给日内瓦的人权委员会。看来美国代表在他国家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高压下，来不及等待人权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了。我们体谅到也认识到他的困难。

昨天，非洲集团本月份的主席达荷美大使非常清楚地对莫伊尼汗先生诬蔑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的话作出了非洲国家的回答。这个回答再清楚地不过了，我觉得无需再在这个讲坛上对那些诬蔑作出回答，因此，我决定把我的答复送达联合国秘书长，并要求他将这份答复作为大会的正式文件分发。然而，达荷美代表和在他前面发言的利比亚代表以及塞内加尔代表的答复，似乎并没有象他们所希望的那样使美国代表得到启示，我必须说，米切尔先生把自己打扮成小丑并把整个演出变成一场十足的滑稽戏。至少可以这样说，他所说的一切都不过是废话，同达荷美大使今天早些时候所说的毫不相干。

莫伊尼汗先生说阿明总统是“种族主义的杀人犯”。哎呀！谁是种族主义的杀人犯呀？让我告诉你，在美国人民还不知道国内密查行动的问题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坚决抵赖他们的所作所为，其方法同他们惯于抵赖他们在外国的活动一模一样。美国中央情报局这些年来所干的最阴险的罪恶，是人类历史上以来没有记录过的，在今天，这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寄送毒物去杀害刚果当时的革命领袖卢蒙巴，这是记录在案的；美国情报局组织了流产的吉隆滩入侵事件，这是记录在案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谋杀吉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这是记录在案的。只提这几件例子来说明这个谋杀团能够做到的事情就够了。

至于这个国家受犹太复国主义者影响的程度，我要绝对清楚地指出，阿明总统并不是第一个提到世界这个地方受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和控制的人。许多地位崇

高的人，包括美国官员，都已经提过这件事。

美帝国主义者的代表还说，美利坚合众国将继续保护犹太人、阿拉伯人、亚洲人和非洲人。这只是最高级的彻头彻尾的骗局和伪善，是头脑混乱的一个反映，除非对他来说，镇压和保护具有相同的意义。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美帝国主义者正是利用保护亚洲人之名，在二十多年之内屠杀了千千万万的越南人民。我们也知道美帝国主义者正是利用保护非洲人民之名，把武器、金钱和毒品送给南非和非洲大陆其他地区的种族主义政权。我们也知道美帝国主义者正是利用保护阿拉伯世界的人民之名，曾经并且继续把尖端武器运给以色列，因而不仅消灭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而且也消灭犹太人。甚至到今天，美帝国主义者还在有利地考虑着用能够携带核弹头的潘兴火箭来武装以色列。这就是美帝国主义者答应给予世界人民的保护吗？

我们不应受感情用事和耸人听闻的言辞的欺骗。这种论调对大会到现在为止所进行的建设性的和合乎情理的辩论，毫无助益。我对莫伊尼汗先生的调言的唯一建议就是：他应当使自己镇定下来，再谈一遍阿明总统的讲话，我希望他最后将领会其中的要旨，和生龙活虎的革命热情。最重要的是，如果他看不懂这篇讲话，他是可以随时向乌干达常驻代表团请教，而不必跑来跑去，高喊那些毫无意思的空洞口号。

总之，我要澄清攻击阿明总统的人大加利用的一点。

我敢肯定美国代表对这一点很清楚，但是却故意抹煞真相来进行他的讨伐。阿明总统要求“消灭以色列这个国家”。随后，阿明总统在他的讲话中要求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存在，在这个国家里，阿拉伯人、犹太人、基督教徒、回教徒以及其他宗教信仰和种族都和睦地、安定地和平等地相处。犹太复国主义者就不允许这种情形。犹太复国主义是以种族和宗教为基础的。犹太复国主义是人为的以色列国的社会哲学和政治方面的意识形态。一个建筑在这种哲学和意识形态上面的国家同世界社会的其余部份不能共存，也不可能符合联合国宪章奉为神圣的条件。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漠视、蔑视和不理联合国的所有决议的原因。

主席：我必须要求乌干达代表遵守时间限制并结束他的发言。你必须遵守规则。

基尼恩先生（乌干达）：我非常感谢主席。我希望我的话已经从这个讲坛上传达到了美国代表那里。

皮尼斯先生（西班牙）：今天早上，摩洛哥外长控制了西班牙的城市休达梅利利亚以及阿卢塞马斯岛、贝莱斯岛和查法里纳斯群岛。我国代表团在大会今年二月十三日的A/AC.106/477号文件中清楚地阐述了我国和我国政府的立场。为了避免详细论述此事，我只要说我国的立场还是一样，并无改变。我只愿指出任何拿直布罗陀来相比的作法都是没有根据的。关于这一点，我要提醒各位，在直布罗陀的情形是全体居民被驱逐了，而在提到的城市里却住有土著居民。

摩洛哥代表团曾一再并且一直接受大会关于在西撒哈拉应用自决原则的各项决议。正如西班牙外长在这个讲坛上所指出的，我国本着构成西撒哈拉非殖民化过程的基础的国际合作精神，同意让全体居民自由地决定他们自己的前途，允许他们同其他马格里布国家进行有成效的合作，以便维持那个地区的稳定，从而维持那里的和平。他又在另一段发言中说，西班牙殖民于西撒哈拉，除了土著居民外，不必征得任何人的同意。西班牙已经遵守了宪章关于非自治领土所规定的程序以及大会的其他各项决议，而在那些决议中，有一些国家被称为“有关当事国”，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举行全民投票以进一步保证自决的权利。

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日，西班牙政府转达了它的决定，即依照第3162(XXVIII)决议所规定的方针让该领土实行自决。后来，在第二十九届会议上，大会在第3292(XXIX)号决议中，决定请求国际法院提供咨询意见，推迟管理国家所设想的全民投票，并应我国的邀请派遣一个视察团。

我国同意遵守这个决议所确定的程序。全民投票推迟举行了；视察团已于今

年五月前往该领土，我们希望不久将看到有关的报告。 国际法院也即将发表它的咨询意见。 关于这方面，我要回顾一下国际法院主席在专门审议西撒哈拉问题的会议结束时所说的话。 他说他感谢西班牙在口述程序期间对法院的支持。 他也对西班牙政府在这件事情上所给予的宝贵帮助表示赞赏。

看来，摩洛哥外长把那些在法院里为了要维护以本案言，就是西撒哈拉居民的自决权的基本立场，而必须充分利用的因素弄错了。 他的态度是否定的而且生硬的，这清楚地是与事实不相容的。 摩洛哥政府既然决定要求国际法院提供咨询意见，而现在竟然企图在审议中的问题即将结束审议的时刻，用文件和证据不足的借口来支持自己的立场，我国政府对此感到惊讶！

我国政府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 它已经就这个问题提供了全部的文件。 就象第 3292(XXIX) 号决议所指出的那样，法院的咨询意见将是判断的附加因素，而并不妨碍居民的自决权利。 今年五月二十三日，我国政府明确地正式宣布，决定不再留在这个领土上，并“促请各邻国负起维持和平的责任。”（第二三六七次会议，英文本第 54—55 页）

我国作为一个一贯持有正确态度的管理国，只要求能在顾到尊严和荣誉的情况下离开这个领土。 我们已经遵守了各项决议。 关于这一点，我愿再次回顾一下西班牙外长在提及联合国赞助下举行的全民投票时所说的话，他说：

“不管为实行自决而举行的这次全民投票的结果如何，撒哈拉人民自己，也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决定这件事，因为把解决办法强加给他们的观念——如果实行的话——会使整个非殖民化的前景变得很不稳定，这是非常危险的。 “他又说：”……我国将继续承担管理国的责任，直到非殖民化的过程结束为止，只要其他国家，特别是邻国尊重这个过程的和平进展，不要让这个过程所基于的原则受到干扰，因为这些原则都是按照宪章的规定和大会的附加决议确定的。 如果形势发生任何变化致使和平受到威胁并且使我们的责任的完成受到危害，那么西班牙政府就保留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以维持和平的权利，并采取任何能力所及的必要行动来完成非殖民化过程”。（同上）

撒哈拉的非殖民化过程无效地受到拖延，这是不能责怪西班牙的。我国政府认为——我再援引西班牙外长的话：

“这个非殖民化过程应当让它尽快地结束。我们相信大会这次会议将为此目的通过一项决议并且尽快定出一个期限。”（同上，第57页）。

我国代表团将一如既往地同第四委员会合作，在本组织的各项宗旨和原则的范围内，为该领土的非殖民化寻求和平合理的解决办法。”

斯拉维先生（摩洛哥）：西班牙常驻代表再次企图使我们相信他的政府的用意是纯洁的——就内容来说是纯洁的，因为他说，西班牙在撒哈拉不再有任何利益；就它对问题的态度来说是纯洁的，因为西班牙一贯地希望加速非殖民化的过程，而摩洛哥——他又说——却采取了相反的态度。

西班牙代表的发言和坚持不肯放弃拖延手法的态度，进一步证明了他的政府心里有鬼，也证明了他的政府陷入了极大的矛盾。而西班牙本身过去和现在都应当对这种拖延手法负责，因为这阻碍了西撒哈拉的真正非殖民化过程。其实，不可能一方面对本组织的原则表示极大的尊重而另一方面又阉割这些原则的实质内容。

我只想扼要地把事实说明，而这些事实太多了。从一六六六年到一九七三年这八年中，西班牙有系统地既反对各项决议草案又反对派遣视察团前往撒哈拉。一九七四年，大会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第3239(XXIX)号决议。这个决议请求国际法院发表意见。

大会对西班牙是否真诚地要让这个领土获得真正解放极表怀疑，因此自己安排了一个关于这个领土的自决问题的全民投票。

其次，大会承认西撒哈拉问题的特殊性，并承认在推进非殖民化过程时，对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的领土完整的权利需要加以适当的考虑。此外，在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国际法院关于法院的会员国资格的裁定中也庄严地确认了这一点。这

个裁定指出，当西班牙和摩洛哥界间确实发生争端时，就决定由摩洛哥指派一个专案法官在法院里代摩洛哥行事。

因此，第3239(XXIX)号决议的正当合理已经相当清楚和明显了。此外，西班牙非但没有尊重这个决议以及对国际法院给予帮助，却反而再次采用一系列的手段来阻挠本组织的行动。西班牙就是这样向国际法院提出一切它可以想象得到的诡辩，以迫使法院无法执行其作为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的任务。它认为大会只向法院提出了那些具有学术性质的毫无兴趣的问题，因此，法院在这种情况下应避免指导大会。

摩洛哥认为，这些策略是西班牙公然反对联合国方面的行动的一个表现。不过，西班牙政府今年五月二十三日的官方宣告才最清楚地暴露了这个管理国的恶毒的阴谋。事实上，就在国际法院发表它关于承认摩洛哥和西班牙之间有一个法律上的争端的裁定的第二天，西班牙注意到它的诡计已经在世界舆论前暴露无遗之后，就宣布它希望尽快地从这个领土撤走，把政权交给所谓的地方当局。这样，西班牙也就暴露了它的一贯阴谋即在联合国之外进行活动并制造一种假象，以便它的统治能够长久保持下去，从而损害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的基本权利以及撒哈拉人民本身的基本权利。

西班牙要将这个领土的管理权力交给谁呢？给那个权力机关设在拉巴特的撒哈拉全国联盟党呢，还是给被它监禁在阿尤恩的同一个党的分裂派呢？西班牙会决定将全权授予撒哈拉大会吗？这个大会是西班牙自己设立的，而且它的主席几天前才离开撒哈拉。此外，西班牙打算挑选“蓝色人”这个革命运动组织或是解放与团结阵线呢？它们的领导人都流亡在外，分别住在布鲁塞尔与拉巴特。即使西班牙打算同唯一的里奥德奥罗和萨基亚阿姆拉的解放党进行谈判，它还得在该党设在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和阿尔及尔是三派之间进行挑选。

联合国推行明智的政策，将把西班牙的阴谋看作阴谋而加以对待，并将保证在非殖民化的过程中尊重有关双方即毛里塔尼亚和摩洛哥的民族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权利。

至于西班牙在毛里塔尼亚的各殖民飞地问题，我国政府根据所有不结盟国家在利马会议上所表示的支持庄严地向西班牙政府建议，为了和平地撤出休达、梅利利亚、查法里纳斯群岛和佩农德贝莱斯，应当开始直接谈判。

我们不能不指出，这个提议同西班牙在这里向英国政府所提要求收回直布罗陀的建议是何等的相似。西班牙政府不能同时维护一样东西的正反两面，在国际上，它必须完全承担它所采取的立场的后果。这两个情况都涉及很久以前在胁迫下签订的条约攫取飞地的。西班牙政府必须言行一致，立即开始与摩洛哥进行谈判，并且商定一些放弃它的殖民飞地的方法和手段。

图克门先生（土耳其）：我要简要地谈一谈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今天下午的发言。我敢说大家都觉得这个发言必定会引起土耳其代表团方面的答复，因为大部分讲话是针对土耳其而发的。

我注意到大会主席今天上午就西班牙代表的请求所作的发言。我们认为他的发言不适用于这个场合，因为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只是代表希族塞人社区讲话，而希族塞人社区只是组成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两族社区之中的一个。塞浦路斯土族联邦主席腊乌夫登克塔什先生阁下已经在发给大会主席和秘书长的文电中将这一点说得非常清楚了。可是，由于礼貌上的关系，和为了尊重这个庄严的组织的主席起见，我将避免评论大主教的讲话的实质内容。我只要说我们将行使书面答复的权利。

我期望土族社区在即将到来的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辩论中也让大家知道它的观点。

我国代表团重申：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没有任何权力代表土族社区讲话，因为他不代表任何一个塞浦路斯的土耳其人。我敢肯定，他的偏袒的和具有污蔑性的讲话非常清楚地证实这一点。

皮尼斯先生（西班牙）：我国代表团不明白摩洛哥代表团使本大会真相不明的用心。摩洛哥代表团应当耐心一点。视察团的报告很快就要出来了，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也很快就要发表了，而这两份东西将会把事情的真相摆出来。

我要斩钉截铁地驳斥对我们的指控，即我们不是企图引起大会的混乱，就是企图使非殖民化过程陷于混乱。

摩洛哥代表很清楚地知道，在同其他领土的居民一样具有自决权利的这个领土的居民还没有足够的资源之前，这个领土要实现自决是不可能的。幸而使这些游牧居民定居下来却是可行的。这就是推迟实现自决的原因，这些居民都在那里，拥有大量的财富，很可能正是这些财富使其邻邦垂涎三尺。直到最近为止，没有一个人关切这个领土。

我愿重申：西班牙政府在它同西撒哈拉相邻的国家的接触中不停地寻求一个谅解的基础，以便建立可把有关各方的利益同当地居民的利益结合起来的关系，从而保证马格里布的和平与稳定；这是谋求富有成效的合作的必不可少的基础。

西班牙政府认为——而我是西班牙政府指定的发言人，任何其他对真相的歪曲都是与事实不相符的。

罗西迪斯先生（塞浦路斯）：当一个国家元首在大会上讲话时，他是以一个国家元首的身分说话，而不是参加大会的一般性辩论，因而没有答辩权可言，这是联合国长期以来的惯例。今天早上大会主席在处理关于墨西哥总统的讲话时就适当地坚持了这个惯例。对塞浦路斯总统的讲话，也应当援用同样的惯例。

可是，土耳其代表却被允许在讲坛上发言，并对总统代表塞浦路斯共和国讲话的权利提出质疑，而且还把他的讲话称为“偏袒的和具有污蔑性的讲话”。这是给大会在程序上开了一个令人遗憾的先例。

土耳其代表说，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不代表塞浦路斯，这不仅是站不住脚的，

白费心思的，而且还是目中无人的，因为事实上联合国和所有会员国都承认他是塞浦路斯的总统。

在去年的大会上，马卡里奥斯总统在讲话中也以至少同样明确的话提及了土耳其入侵塞岛的事，但是大会不允许对他的讲话行使答辩权。土耳其代表到底根据什么理由妄称塞浦路斯总统在联合国里没有平等的权利呢？是不是因为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犯下了国际性的罪行，以致其领土的百分之四十处于侵略者的军事统治下，20万土著塞浦路斯人在武力下被赶离家园、被迫放弃财产，以及从土耳其运来的大批人民占据了被驱逐的塞浦路斯人的房屋和财产，以便达到改变塞浦路斯的人口比例的性质的目的呢？

土耳其代表实际上是在要求大会认可这种罪行。这显示出土耳其是以什么样的精神来对待联合国和对待文明社会的信条。他要弱肉强食的规则应用于塞浦路斯并在这里反映出来，作为大会回到野蛮状态的一个规则。

斯拉维先生（摩洛哥）：西班牙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几分钟前说，如果西班牙确实耽误了撒哈拉的非殖民化过程那是因为它迫切需要等待游牧居民变成城市居民。那么，他也就承认西班牙曾经大大地推迟了非殖民化的过程。关于游牧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这回事，我是一个从摩洛哥南部来的摩洛哥人，我知道由有能力的和诚实的人编写的视察团报告将毫无疑问地告诉我们游牧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

西班牙常驻代表提出的第二点是：摩洛哥在撒哈拉的矿产宝藏，即磷酸盐，还没发现之前并没有对这个领土提出要求。首先，我必须指出摩洛哥早在一九五六年便提出了这些要求。其次，撒哈拉的财富的储藏量是17亿吨到23亿吨，那就是大约20亿吨。我必须向大会的各会员国提出，摩洛哥的磷酸盐的储藏量达500亿吨；那就是说撒哈拉的储藏量只及摩洛哥的储藏量的百分之四。严正地说，摩洛哥不会只是为了收回它的百分之四的资源才要求它的领土完整的。我必

须指出实际上我们的领土要求在我们于一九五六年获得独立的那一天便提出来了。

关于第三点即西班牙一向表示要由各有关方面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点，摩洛哥从来没有拒绝这种可能性，而是在每一次试图安排这样一个会议时西班牙都提出不合理的条件，从而使这些试图都一一失败了。

因此，如果西班牙准备在正常和客观的情况下同我们进行会谈，并考虑到这个领土现在和过去的历史，那么我们就同意与它进行会谈。

图克门先生（土耳其）：我要行使对罗西迪斯大使的答辩权。

罗西迪斯大使的激昂的发言，充满了歪曲、毫无根据的诬蔑和枯燥无味的谩骂，他忽略了塞浦路斯历史上两个重要的日期，而这两个日期对他所说的我们不承认马卡里奥斯为塞浦路斯国元首的事是极有关系的。

罗西迪斯大使应当记得标志着塞浦路斯的悲剧的开始的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那一天，对土耳其社区来一个屠杀的讯号发出了，其结果是无数的土耳其人被杀害，整个社区无可避免地在压迫、耻辱和恐惧下生活了十多年。在那一天，以两族平等参与国家大事为基础的塞浦路斯宪法遭到了粗暴破坏并被废除，国家机构也被转化为希腊族人对土耳其族人施暴的工具。

第二个重要的日期是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五日。罗西迪斯大使将记得他所代表的希族塞人政府的首脑在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九日向安全理事会讲话时对去年七月发生的事件作了如下的叙述：

“希腊军事政权无情地侵犯了塞浦路斯的独立。希腊军人执政团……毫不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和国家主权，把它的独裁统法“非法地”伸到塞浦路斯来。”（S/PV.1780. 第4页）

他说，正是一种侵略行径侵犯了共和国的独立和主权：

“只要希腊军官一天在塞浦路斯，侵略就一天没有停止。”（同上，第7页）

“……塞浦路斯事件并不是塞浦路斯希腊人的内部问题。塞浦路斯的土耳其人也同样受到影响。希腊军人执政团所策动的政变是一种侵略行径，它的后果使全体塞浦路斯人民——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人——都受到损害。（同上，第9页）。

从希族塞人政府的首脑的发言中援引的话就到此为止。

这确实是对一九七四年七月所发生的事件的生动的解释。正是希腊的侵略破坏了塞浦路斯的独立和主权，威胁土耳其族的生存。土耳其所采取的行动并非别的，只是那些与国际条约相符合的行动，以防除对塞浦路斯的独立和主权的迫切威胁和针对两族的直接威胁。土耳其的干预是合法的、正当的和正确的。如果土耳其没有进行干预，塞浦路斯将永远失去其独立并被迫在专制之下生活永远不得翻身，这种专制制度在今天是很有理由令人憎恶的。

因此，我们最好避免进行不必要的论争和浮夸的表演，而应把我们的精力和注意力集中在解决冲突的现实的方法上。

土耳其外长本着这种精神最近在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指出：

“……土耳其政府认为任何解决办法应当以下列的原则和考虑为基础：

“第一，现在两族正在根据联合国的各项决议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谈判。任何破坏这种平等原则的企图，任何旨在散播猜疑的阴谋只能使谈判无法继续进行。

第二，塞浦路斯冲突的最后阶段起源于一个外来的旨在结束这个岛国的独立的军事政变。任何将来的解决办法应当以尊重塞浦路斯的独立、领土完整和主权为基础。塞浦路斯国应能遵循不结盟的政策，这是对两族的利益的最好的反应而且也有助于东地中海的和平与稳定。”

“第三，这个岛国的宪法应当规定建立一个由两个地区组成的联邦国家，并采取各种形式和安排以照顾这个岛国的经济情况，两族的组织结构和需要以

及在安全与互相信托的基础上保证合作的需要。”

“第四，两族应当平等地参加联邦政府。”（A/PV.2364. 英文本，第72页）。

大会明智地而安全理事会也不断地倡议在两族之间举行谈判。绝大部分参加一般性辩论的代表们也都表示了同样的愿望。

土耳其族已经表示愿意进行有意义的谈判。希族塞人的代表们如果出力来创造适当的对话气氛，对他们那一族的事业将更为有利。

可是，要对希族塞人政府首脑作出这种贡献的能力不真正感到怀疑，是很困难的。土族塞人命定与希族塞人一起生活并且十年来遭受残酷的压迫，因此很久以前就得出了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结论，即这个希族塞人政府首脑不可能对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作出极积的贡献，而且只要他的思想占上风，就不可能有任何解决办法。

他不能摆脱他执迷不悟的困境，这一点在他最近与劳伦斯·斯特恩的谈话中非常清楚地显示出来。这次谈话发表在一九七五年夏季的《外交政策季刊》上：

“我在两族间的会谈中似乎从来不能同土族人达成协议，这个事实或许是对我的政治生涯的延长的说明。”

我们是否应当为了延长政治生涯就永远放弃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和恢复东地中海的和平与稳定？

罗西迪斯先生谈到了侵略问题，虽然正是希族塞人政府在一九六三年发动了对土耳其爱国同胞的侵略。早在一九六二年，年青的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当时的国家元首就在令人难以相信的发言中挑动他的一部分人民去反对他的另一部分人民。我只援引其中之一如下：

“土耳其种族一向是希腊主义的可怕敌人，除非把组成这个种族一部分的为数很少的土族人驱逐出去，不然塞浦路斯自由斗争民族组织的英雄们的任务将永远不能认为完成了。”

罗西迪斯先生谈到了占领问题。正是马卡里奥斯大主教自己邀请希腊占领军来塞浦路斯的。他当一个被外国占领的塞浦路斯的元首已经十多年了，最后都被他请来的那个军队推翻。他谈到了难民问题。他通过自己的有系统的政策，在过去十年内，迫使土族塞人在他们自己国内三次成为难民，而且现在仍然是难民，而他今日竟能大谈难民的困境，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他谈到土耳其分裂这个岛国的计谋，可是他本人却发誓要将这个岛国完整无缺地奉送给希腊。

塞浦路斯的土族和希族忍受苦难，已经太多、太久了。这个悲剧必须予以结束。而这样的一个结束，只有在获得一个能够维护两族的相互利益和促成并保证他们之间的真正合作的解决办法的情况下，才会到来。那么让我们永远地放弃宣传和诬蔑并为这个目标而奋斗吧！

主席：塞浦路斯代表已经表示他要行使答辩权。但是，我要首先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发言。他要就程序问题发言。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这种马拉松式的答辩是没完没了的，因为每一个答复引出另一个答复。我们已经耐心地忍受这一切了。我看不到什么时候才会了结，而且时间也很迟了。因此，我要求立即休会，这是我的权利。

主席：根据议事的规则，休会的动议应不经辩论即付表决。因此，我现在将沙特阿拉伯代表提议的休会动议付诸表决。

动议以四十票对五票，二十四票弃权通过。

下午七时三十分散会